

一个前外交官的亲历采访
一部中美关系的秘密档案



影响白宫对华政策的

“

中国通

”

金先宏 著



时事出版社

K837.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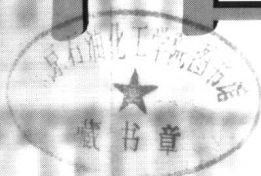
26

一个前外交官的亲历采访
一部中美关系的秘密档案

影响白宫对华政策的

“中国通”

金先宏 著



00181504



石化 S1815044

时事出版社

影响白宫对华政策的“中国通”

——一个前外交官的采访手记

金先宏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影响白宫对华政策的“中国通”——一个前外交官的采访手记/金先宏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2

ISBN 7-80009-742-0

I. 影… II. 金… III. ①政治家—访问记—美国 ②美国对外政策: 对华政策—研究 IV. ① K837.127 = 5 ② 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0027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5 字数: 360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1.00 元



金先宏，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英语教员；1980年起，曾先后任驻英国大使馆二等秘书、驻美国纽约总领事馆领事及旧金山中国留学服务中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现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前 言

“中国通”是美国的一个专门名词，狭义上专指某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中国任职的美国外交官。他们或是出生在中国，或是长期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他们一般汉语流利，非常了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状况。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 20 世纪 50 年代初“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受害者。他们被指责要对美国“失去中国”负责，并为此备受打击。他们当中，最知名者乃三位“约翰”，即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 Jr.）和范宣德（John Cater Vincent）。此三人皆名“约翰”。

然而，本书将“中国通”的范围加以扩大，使其



涵盖美国那些过去和现在对中国有客观和深刻了解的人士。他们从美国的长期国家利益出发，将意识形态考虑降到次要位置。他们反对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当成敌人，确信两国的共同利益超越它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他们主张和中国加深相互了解，增强彼此合作，并长期为此不懈努力。他们当中不仅有外交官、军人和学者，还有其他方面的人士。如不考虑其汉语水平，则老“中国通”无疑还应包括乔治·马歇尔将军（Gen. George Marshal）、史迪威将军（Gen. Joseph W. Stilwell）、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imore）和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而新“中国通”当然少不了基辛格博士（Dr. Henry Kissinger）等。与这些真正的“中国通”相比较，在美国还有一些人，他们或许曾到过中国走马观花，或许浮光掠影地读过几本有关中国的书籍，就自诩为中国问题“专家”，便经常发表讲话和文章，宣扬“中国威胁论”。这些人对中国的了解不仅极其肤浅，而且



抱着顽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来论述中国问题。还有些人甚至怀着不可告人的险恶目的鼓吹与中国为敌。他们根本算不上是什么中国问题专家，其主张不仅影响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而且与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也背道而驰。

纵观二战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国通”在各个阶段的作用非常引人注目。二战时期美国的驻华外交和军事人员主要由一批年轻有为、血气方刚的正直人士所组成。军方以史迪威将军为首，麾下包瑞德上校（Col. David D. Barrett）等军官；使馆由高思大使（Ambassador Clarence Gauss）牵头，率领着如三位“约翰”这样的一班精英干才。他们忠诚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一心考虑的是如何能够尽早打败日本法西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同情中国共产党，但却能超越意识形态考虑，实事求是地报道和反映中共控制区的官兵一致、军民一家，有效地在进行着抗日战争的事实。他们作为国民党政府盟国的官方代表，能对蒋介石消



极抗战、积极反共、专制独裁、祸国殃民的倒行逆施予以无情地揭露和抨击。由于他们难能可贵的诚实精神，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当政者。于是，在中美关系中曾一度出现过美国几乎向中共直接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并与后者并肩作战以彻底打垮日寇的可能局面。此外，他们的努力还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遏制了蒋介石在战时就发动令亲者痛、仇者快，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种种企图。

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某些尚未被清除出政府的“中国通”，如担任国务院远东司司长的范宣德，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歇尔和美国政府，使其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实行了一段时间的武器禁运。老“中国通”们虽然未能促使美国和中共建立关系和阻止美国向国民党进一步倾斜，但他们对国共两党内战前景的正确判断，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大规模地对中国内战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如其不然，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或许有可能会推迟，中国人民所遭受的



损失将会更大。亲国民党的“院外援华集团”（China Lobby）对他们非常仇视的主要原因恐怕亦在于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老“中国通”在对华事务中几乎被排除殆尽，美国对华政策就此陷入了一条死胡同而不可自拔。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声称新中国支持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向南方发动进攻，一方面于6月27日根据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命令，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直接干预中国内战；另一方面，罔顾中国政府的再三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一直打到鸭绿江边，威胁到新中国的国家安全。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Gen. Joseph McArthur）还在访问台湾时发出战争叫嚣。如果当时老“中国通”仍然在参与美国的对华决策，他们就会作出如下判断：刚成立的新中国决不会轻率地卷入一场新的大战。如果麦克阿瑟向当时任驻台湾“使馆”武官的包瑞德上校进行咨询，或许他就不至于狂妄到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会“不堪一击”。整个五六十年



代，正如范宣德所观察到的，在国务院的对华事务官员中，居然鲜有会讲中文者。这可能是长达二十年内中美两国严重对立的一个原因吧。“盲人骑瞎马”这句成语生动地形容了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此外，由于“麦卡锡主义”的阴魂长期不散，美国的中国研究多年来也不能脱离意识形态的羁绊。费正清等汉学“泰斗”根本无法畅所欲言，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对当时的美国对华政策影响极为有限。

尼克松主政后，国际、国内形势，尤其是前苏联的严重威胁，促使他在对华政策上开始改弦易辙。美国的对华政策方从“空中楼阁”逐步回到现实。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尼克松重新制定对华政策时，未见有知名的“中国通”直接参与，但国务院的班子里尚有马歇尔·格林（Marshall Green，1998年去世。他对中国有较多了解，曾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和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但严格来说，当时他尚不能算作真正的“中国通”，因为他原是日本问题专家）和



恒安石（Arthur William Hummel, Jr. 1920 年出生在山西汾阳，1981 - 1985 年任美国驻华大使。2001 年 2 月 8 日病故——笔者按）等。但是，注意到有关美国外交官和“军事观察组”从延安发回的报告等重要文件于 1968 年“解密”这一事实，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尼克松及其幕僚班子或许曾从中获得过一些启发。因此，应当承认，老“中国通”对中国问题的大量分析实际上还是对尼克松起了某些间接作用。我们在阅读尼克松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的一些文章和讲话时，不禁发现这位当年曾积极参与迫害老“中国通”的共和党右派政客有不少对中国的看法和用语，竟然与谢伟思当年的看法异曲同工。

卡特主政后，美国政坛涌现了一批新“中国通”，如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 1938 - 2001）等。他们在中美建交的过程中和马歇尔·格林、约翰·霍尔德里奇（John Holdridge）、恒安石等均发挥了具体的推动作用。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一些“新”、老中国问题



专家（或“中国通”），如费正清（John K. Fairbank）、鲍大可（Doak Barnett）、白鲁恂（Lucien Pye）、施乐伯（Robert Scalapino）、傅高义（Ezra Vogel）、兰普顿（David Lampton）、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及何汉理（Harry Harding）等都活跃在中美关系的舞台上各领风骚。20 世纪七十年代，中美关系发展中的曲折相对较少。1989 年后，苏联、东欧发生巨变，美国出现一股将下一敌对目标指向中国的浪潮，大有“山雨欲来”、“黑云压城”之势。然而，在铺天盖地的喧嚣声中，仍不时可听到鲍大可、奥克森伯格、兰普顿、李侃如和何汉理等发出的不同声音，给被严重污染的中美关系带来一丝丝“清风”。

1992 年，当克林顿总统参加竞选时，因处于在野身份，曾就对华关系严词抨击布什“软弱”，并使用了极其强烈的语言攻击中国。但他主政后，态度逐步发生变化，甚至于 1998 年提出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



系”这一设想。我们有理由认为，一些担任其“智囊”的新“中国通”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从他们发表的言论和文章中可以看出不少关联。由于许多资料在美国迄今尚未解密，笔者只能根据采访和已掌握的资料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情况尽力加以叙述，但仍显得较为粗略，希望读者能够谅解。

目前，美国某些国会议员、部分主流媒体、右翼宗教团体、人权组织和工会等利益集团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又在鼓吹“中国威胁论”和将中国“妖魔化”，其来势甚为凶猛。美国国内也正为中国孰友孰敌进行着一场辩论。但笔者坚信，时代不同了，“麦卡锡主义”再次在美国盛行已极少可能。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毕竟超越分歧和矛盾。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interdependence）也几已达到难以逆转的程度。展望21世纪，一个较为稳定、和谐的双边关系将对两国人民乃至世界和平和繁荣带来福祉。目前，中国国内有一些学者对两国关系持较为悲观的看法。有的人甚至



认为两国关系中“斗争是绝对的，合作是相对的”。科索沃问题发生后，就有人断定美国的下一打击目标很可能是中国。这种臆测说明，不仅美国有许多人不了解中国，国人实际上也需要更多地了解美国。今天，美国有着相当数量的“中国通”在深入研究中国，因此，培养更多对美国有深入了解的“美国通”应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先生在参加恒安石的追思会上发言时，就指出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当今世界，资讯发达，和延安时期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的现领导不仅对世界大势了如指掌，而且他们也越来越熟悉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法律。对美国的两党政治、三权分立和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和斗争所造成的问题也有所了解。他们已更能区别美国的官方政策和党派言论。他们对美国政坛和媒体不断发出的噪音已见怪不怪。正如江泽民主席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所说：“我听到了他们的声音。我的办法就是讲



得比他们更响。”确实如江泽民主席所说，加强我们的声音，“见招拆招”，让美国人民更加了解我们，将有助于中美两国在新世纪的合作，有利于我们为实现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一个更加稳定和有利的国际环境。

笔者在美国工作期间，有幸结识了老“中国通”的代表人物——谢伟思先生，并拜读了他的《在中国失掉的机会》一书。该书将笔者引入了一个先前一无所知的世界，使我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和不尽的遐思。经反复阅读，笔者不禁对美国与中国，特别是与新中国关系的演变得出了全新的概念：原来毛泽东和中共老一代领导人曾经对与美国合作，改造和建设中国寄予了美好的期盼。美国官方居然会有许多了解中国、富有良知和激情的人士曾孜孜不倦地敦促美国政府执行一项现实的对华政策，并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新中国并非主要出于意识形态考虑才与美国对抗的。两国长期对立的根源，是美国政府将自己的利益紧紧

与蒋介石政权拴在一起，从出钱出枪到直接武装干涉中国内战。因工作关系，笔者还与史迪威将军的长女南西（Nancy Stilwell Easterbrook）多次见面，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笔者也阅读了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 Tuckman）女士的大作《史迪威及美国在华经历——1911—1945》、罗曼纳斯（Charles F. Romanus）和桑德兰（Riley Sunderland）二人合撰的《史迪威的在华使命》（Stilwell's Mission in China），进一步了解了中美两国是如何从盟友走向敌对的。早在回国以前，笔者就暗下决心要按自己的理解将这段历史撰写成书。此后，我又阅读了数十部有关书籍，并多次赴美采访有关人士和专家。他们中有芮思（Edward Rice，老“中国通”。二战时为驻华外交官，现年93岁）、潘菲尔德（James Penfield，老“中国通”。二战时为驻华外交官，现年93岁）、霍尔德里奇（John Holdridge，出生在中国，2001年病故）、恒安石（2001年病故）、马歇尔·格林（1998年病故）、鲍大可（出生在上海，1999年